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李贞乾穿着长衫，身材高大，头发向上竖立，一脸刚毅，他走上台，挥动着拳头，大声说道：

“大家静一静！来自鲁西南和徐西北各县的抗日战士们，这里是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和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土地，我们都有共同的祖先，南四湖的一湖清水滋养着我们，让我们亲如一家，可是，日军来了，杀害我的父老乡亲，今天，我们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成立了，我们要拿起枪，真刀真枪地和日本人干！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我们湖西人民不是孬种！”

下面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王文彬也走上主席台，他身穿长衫，戴着深度眼镜，大脑门发亮，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他朝大家深深作了一个揖，向上推推眼镜，缓缓说道：“诸位乡亲，诸位英雄，过去我们共产党一直在地下活动，秘密地发展。如今，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占领了我们的家乡。但是，我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懦弱的民族，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岂能让日寇横行霸道？共产党在混乱局面中挺身而出，组织人民坚决抵抗，苏鲁豫皖边区各县都成立了抗日游击队，今天又汇聚在一起，聚集起抗日的力量，打出我们的旗子，肩负起全民族抗战的责任！”

游击队员们高举着手里的各种各样的武器，高呼口号：“打日本，保家乡！”

“抗日有饭吃！”

掌声和呼喊声如暴风雨一样震耳欲聋。

接着，郭影秋笑吟吟地走到台上，大声宣布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负责人名单：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任政委，郭影秋任政治部主任，张如任参谋长。

接着，郭影秋又宣布了各个游击大队的编号和大队长、政委的名单。因为之前张光中带领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已经有了四个大队，所以这次从第五大队开始编号。沛县的游击队被编为第五大队，丰县的两支游击队被编为第六、第九大队，砀山县游击队被编为第七大队，单县自卫团联防队被编为第八大队，金乡游击队被编为第十三大队，鱼台游击队被编为

第十四大队，萧县来了好几伙游击队，被编为第十五到二十大队，宿县游击队被编为第二十一、二十二大队，铜北游击队被编为第二十三大队，永城县游击队被编为第二十九大队，单县南部的一支游击队被编为二总队机炮连，丰县动委会流动宣传队改编成第二总队宣传队。

接着各个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上台发言，介绍自己大队的情况。第一个上台的是沛县第五大队大队长苗宗藩老先生，他精神矍铄，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斜挎着盒子枪，捋着自己的山羊胡子，慢悠悠地说：“抗战以来，我沛县党组织已经组织了三拨抗日武装。第一拨是张光中拉起来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张光中是湖西沛县宋庄人，在郭子化召开的黄口会议之后，他回沛县拉队伍，今年3月去支援台儿庄战役，之后就去湖东地区的鲁南薛城、滕县一带活动；今年5月徐州沦陷后，中共沛县县委又组成了一支80余人、40多支枪的游击队，后来这支队伍被微山湖边的大土匪籍兴科包围，大部枪支都被这帮土匪抢走了。但是我们沛县人没有气馁，接着，第三次又拉起一支几十人的队伍，由郝中士带领，李剑波、郝中牟、刘昭筹等一批原反帝大同盟的人参加，在沛县南部、铜山北部一带活动，发展到一百多人，今天，我们作为第二总队第五大队，来参加华山大聚义！老朽虽已年过花甲，从事革命十几年，四处奔走，屡进监狱，然日寇侵我中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揭竿而起，奋勇抗战，为我民族解放大业，我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老朽不老，要和爱国青年们一起上战场！”

下面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丰县第六大队大队长康文彬发言。他介绍说，5月初，李贞乾把李新庄农民游击训练班的青年骨干60多人组成抗日游击队。5月日寇占领了丰县县城，这支游击队与丰县二、三、四区的抗日武装会合，组成一百多人的抗日武装，这次被编为第六大队。丰县北部，又组成一支武装，编为第九大队。

(未完待续)

荐书堂

主办单位：济宁晚报 济宁亚龙书城



散文集

《赶往乡村的集市》出版

近日，散文家老土先生的散文集《赶往乡村的集市》由山东省散文学会出版策划中心编辑策划，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每一篇文字，如脚下一片片叶子一般轻盈厚实，每一片叶子都是文字的来源，每一段生活的场景都是作者内心的独白。点点滴滴的文字如秋天的树叶，随风飘落，去接近泥土，带着油墨的味道去亲吻大地母亲。尽一片叶子微薄的心意，以最低的身姿为母亲保暖，真切地感受母亲的博大与宽厚，一点点抚平母亲风雨岁月中的伤痕。这一片又一片叶子，连成一道风景，装点着大地，在一场场秋雨和一场场冬雪里，将自己融化进母亲的怀抱。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故知鲁

曲阜碑刻(七十六) 明永乐二十年 重建孔林斋厅记

王一驰

此石刻于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现镶于孔林思堂东斋东墙，高0.75米、宽1米，碑文由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张敏撰、监察御史孔谔书。

曲阜有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孔府是历代衍圣公的官衙住宅，故也称“衍圣公府”。孔庙又叫“至圣庙”，始建于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由鲁哀公在孔子故居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祠庙建筑的典范。孔林是孔子及其子孙后代的家族墓地，又称“至圣林”，始建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它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便发生在孔林之中。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和祭祖之处。祭祀之日全族齐聚，穿戴整齐，一早便出发，严格遵守“日出而祭”的古礼。其中主祭人还需“斋戒”，以洁净身心，戒除杂念。祭祀仪式结束后，全族会在特定的场所分享祭品，这一行为称为“散胙”，散胙之地被称为“斋厅”。明永乐年间，孔氏斋厅已十分破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家族的繁衍，旧斋厅已不能够容纳族人，以至于出现“披冒风日而列席于外者，天下雨则依栖于宇下”的现象。

当时衍圣公孔彦缙、曲阜知县孔克中以及族长孔思楷谈到此事时分析原因：此前斋厅不够恢宏大气是因为宗族人数较少、力量相对较弱，而如今“涵濡圣化，子孙繁衍”，家族早已壮大，将斋厅重修一番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另外，重建斋厅也能达到“亲骨肉，叙昭穆”的效果。这里所谓的“亲骨肉”，即亲近血脉相连的亲人；而“叙昭穆”则表示要依照长幼尊卑的秩序来排定祭祀位序，以明确家族内部的伦

理关系，强调的是一种维系家族系统平稳运行的秩序。这里所说的昭穆制度值得细细探究。昭穆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是祖先祭祀时的排位规则。商人将始祖牌位居中排放，始祖之子为昭，排在左侧；始祖之孙为穆，排在右侧，之后按父辈子辈之序左右相对摆放牌位，目的是在祭祀中明确世系，避免混乱，这是昭穆制度最原始的功用。到了西周之后，昭穆之序从单纯的祭祀规则升级为贯穿家族与国家政治的完整制度，成为周王朝宗庙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春秋战国后，诸侯征伐，分封制没落，子弑臣逆，宗法制瓦解。昭穆制度的政治功能也逐渐弱化，作为家族伦理符号延续后世。

细究一番不难发现，无论是孔氏家族合力重修斋厅，还是昭穆之序，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基础——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的原型诞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时，人们生活在集体公有制的氏族公社之中，一个氏族公社包含若干父系大家族，父系大家族是由一个男性所生的几代人

及其家庭组成。到后来私有制不断扩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父系大家族的族长、家长拥有了对家族成员的统治与奴役之权，故而原始的父权家长制成为后世宗法制度的萌芽。父权家长去世后，其权利与财产需要有人继承，这更刺激了宗法制度的发展。西周建国后，上层统治者以此原型为框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定了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的关系，保证了嫡长子继承王位，解决了统治集团内部财产与权力分配的问题。为将统治触手伸向更广的区域，西周统治者在设计国家体制时，用分封制与宗法制相配套，让周天子由宗族的大宗上升为天下的宗长，使之掌握全国最高的族权与政权，实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宗统与君统的合一。之后周室虽湮灭，但宗法制催生的宗族观念以及诸如昭穆这样的礼仪规则却传之后世。

经过衍圣公孔彦缙、知县孔克中、族长孔思楷三位族内领袖商议后，斋厅的重建工作展开了。工匠们用坚木建造厅堂，同时又扩大斋厅的规模。竣工后的新斋厅拥有三个大厅堂，东西宽四丈五尺，南北两丈八尺，高二丈一尺，涂壁精美，形制严正轩昂，人人其中“心悅神怡”，如处“春风和气之中”。新斋厅容纳族人绰绰有余，族人终于不用暴露于风雨之中了。

这篇碑文用辞典雅，笔意端凝，完整记录了营缮斋厅之始末，使今人仍可见当年故事。这是历史的伟大功能，它不但记录达官显贵，也铭记广大劳动人民的成就。历史让我们知晓，斋厅的修建不只有县官、族长牵头，还有众多族人、工匠的辛勤付出。